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特征

李艳春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劳动力移民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是不同的经历过程。本文分析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特点, 为迁移过程进行性别方面的理解。分析表明, 农村女性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地域性歧视、职业高度同质化、收入回报率低、暂时性与过渡性等特征。

关键词: 市场转型; 农村女性; 移民特征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3)10-0121-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伴随着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及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寻求就业与发展机会, 女性劳动力移民成为这股浪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口迁移数量大幅度增长。迁移是一个具性别选择的过程, 同男性相比, 婚姻与家庭显然在女性移民者生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因此对于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来说是不同的经历。本文从称谓、职业等方面剖析社会转型时期背景下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特点。

一、称谓

今天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之一是性别特征的突显, 性别话语权的扩大, 即女性劳动者的性别和形象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一点从其称谓上就可见一斑。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求工作的年轻劳动女性通常被称作“打工妹”“外来妹”或“城市外来女工”。该词拥有诸多含义: “打工”的意思是为老板工作或“出卖劳动能力”而不是自雇, 与持久职业形成对比的临时性工作, 处于城市社会秩序之外, 因此社会地位较低——只是一个聘请来的帮手或助手, 隐含于其中的是劳动的商品化和为了工资而进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交换, 也就是在新型劳动关系和官僚结构背景下的市场中形成的劳动交换。“妹”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称呼, 指年轻女子或年轻的妹妹, 这里不

仅仅指的是性别, 而且还包含其婚姻状况——单身、未婚的女性。在城市的话语和媒体中, 打工妹已经成为一种简化了的笼统概念, 遮蔽了流动农村女性的其他形象。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改革开放之前对劳动者的称谓和今天的称谓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打工妹”一词从根本上不同于“工人”。工人是中性的、非性别称谓, 既可以指代男性劳动者, 也可以指代女性劳动者, 从这样的称谓中是看不出性别差异的。在运用“工人”一词的年代里, 更多的是强调阶级范畴。“工人”一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中占据较高地位, 社会主义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 即工人阶级专政, 工人是国家的主人, “工人当家做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百废待兴的年代里, 女性劳动者被引入到“男人世界”中, 无论是在轻工业、重工业还是军工等行业中都可见女性的身影。“妇女可顶半边天”, 她们可以做男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管和倡导下, 各种媒体宣传和制度化安排都将性别差异稀释化。总之, 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是, “工人”一词被“打工妹”或“打工仔”所代替, 逐渐成为一种日常话语。

二、就业

(一) 职业类型高度同质化

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较低, 缺少专业技能, 再加上户籍管理制度及劳动力市

基金项目: 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HEUCF20121303); 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项目课题

作者简介: 李艳春, 女,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场中的性别隔离等因素的束缚,使得农村女性劳动移民的职业选择面相当狭窄,大多集中在不需要技术、工作时间较长、低工资等层次较低的职业类型上,使得她们对于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发展空间受限的职业类型最为具有吸引力。对劳动移民的相关研究表明,同男性移民更容易找到建筑工地和重工业方面的工作相比,女性移民更经常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业、服务业和商业等部门寻求工作。珠三角地区的许多电子加工厂里,70%以上是女性职工。Tam(2000)对深圳工厂的研究表明,那里生产线上99%的工人是女性。^{[1](P24-47)}她们大量涌入到如服装生产、玩具、电子产品制造业工厂进行流水线的装配组装。这些职业大大降低了对工作体能的要求,更加适合心灵手巧的女性,不太适合身强力壮的男性,因此农村女性能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另外农村女性劳动力不仅仅是农民,更是女性,具有更善于“听话”的本性,工厂管理者倾向于认为她们宽容、能够遵守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劳动力便宜,容易培养其守时、合作、纪律观念和团队精神,能够处理微妙性的工作,易于服从男性领导的权威,因此更容易进行控制和管理。

表1 迁移女性职业分布

职业分类	迁出地		迁入地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人员	4	0.7	13	1.5
专业技术人员	17	3.0	31	3.7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9	1.6	44	5.2
商业、服务业人员	62	11.1	443	52.4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392	70.3	13	1.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41	7.3	249	29.5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33	5.9	52	6.2
N	558		845	
卡方	1457.498		1343.548	
df	6		6	
	p < .001		p < .001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做的沈阳、北京、石家庄、无锡和东莞五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迁移女性的职业分布状况见表1。^[2]可以看出,女性在迁移之前,70.3%的人口从事的是农、林、牧、渔等生产,而在迁移之后则主要从事商服及生产操作,具体包括餐饮、环卫、

护理、家政保姆等服务性行业。家政服务被认为是“劳动的真空”,传统观点中将其刻板为脏累、较少个人发展空间且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职业,被城市人认为是低贱的工作。但是正是因为家政服务工作的环境要比生产组装工厂中健康、安全,而且还可以使女性在较短时间内接触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与标准,更容易与大城市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生活行为上更易于受城市生活的影响,所以受到广大农村女性的青睐。

(二) 社会排斥仍然存在

整个社会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处于不利的地位,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其身份与性别均受到多重排斥与歧视。这些排斥来自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女性,第二是农村人,第三是教育文化水平低,第四是来自贫困地区。

农村女性劳动者来到城镇工作,首先要面临的是对城市生活的认知与适应,适应城市的生活与新的职业。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她们不得不抛弃曾经熟知的乡村生活知识,在新的环境中遭遇各种各样的生活危机和文化震荡,面临种种歧视,甚至被其生活的社区排斥在外。她们所受到的排挤与隔离是全方位的,甚至是骇人听闻的。

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女性劳动移民往往更容易受到城里人的排斥和欺辱。中国长期封闭、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里人和乡下人呈现出显著社会等级差异的特征。她们尽管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是僵硬的户籍制度使得她们处于城市的边缘,身处尴尬处境,社会认同度不高。在城市居民看来,她们是愚蠢落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文明、非现代的乡村妇女,她们的劳动被认为是廉价的,常常被描绘成是未开化的,而且城里人经常把她们同懒惰和肮脏联系在一起,不具有当地城市职工所享有的保障和福利。移民的负面形象不断在媒体上被“曝光”,对她们的公开敌意并不少见。

另一方面是地域性排斥。地区、族裔和文化元素联手形成群体身份,将工作场所中的女性劳动者分类并且形成某种地域性的标识。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的年轻女性尽管还是农民身份,但是现在她们是作为城市劳动力而存在的,因此,需要有新的身份附加到她们身上作为标识。通常会听到根据移民的原籍地来称呼她们,如四川妹、湖南妹、湖北妹或者北方妹,来自广东省

的女性移民则被称作广州妹、客家妹。

这种根据地区性标识形成的地域性差异体现出空间上的不平等与排斥。来自不同地域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性格,具有适合不同工作的能力。在对珠三角地区企业工人的研究发现,潮州妹顺从、羞涩、聪明,因此在管理者看来她们更适合于会计及人事管理工作。客家妹害羞、沉默寡言,但是勤劳,因此她们是很好的听众和忠诚的追随者,所以管理者在对其培训后经常依靠并利用她们,将其培养成如工厂监事或生产一线领导者这样的中层管理人员。大多数主管和生产线的领导位置由客家人和潮州人占据,而几乎所有的外省人都得在第一生产线上劳作。^{[3] [P1~18]}

(三) 移民信息来源网络化

许多研究显示,劳动移民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然而,迁移过程涉及的社会网络对男女影响是不同的(Kanaiaupuni, 2000)。^{[4] [P1311~1348]}初次进入城市的打工妹绝大多数是依靠有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人的带领。

一方面,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找工作更加困难,经常受到各方面的歧视与排斥,加上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更具风险性,因此社会网络对她们的流动更为重要。迁移总会涉及一些不确定性,因此包含一定的风险,例如无法找到一份工作,得不到足够的收入以应付城市里的各项开销费用,陌生环境中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困难等等。迁移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在不同性别上也存在差异,女性的迁移风险和成本可能比男性高,因为她们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诸如强奸和殴打这样的风险。因此正是由于女性自身存在的普遍脆弱性以及为了保持、规范家族的荣誉,女性劳动者要想获得家庭对其迁移许可的前提是,要么她们在目的地有亲密的朋友或亲戚,要么与其他妇女一同迁移。因此,获得迁移信息的网络类型可能对于女性来说更加重要。亲属关系、个人和社区为基础的网络不仅提供有关迁入地的信息,而且还能够降低迁移的障碍与风险。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所起到的信息提供和帮助作用的某些机制对于男女来说也是不同的。^{[5] [P55~67]}大多数处于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封闭地区、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妇女由于与主流社会相隔离,她们很少有机会能够从报纸和其他公共资源获得有关就业的正式信息,反而更多地依

靠朋友和亲戚的非正式途径。在迁入地存在着明确性别分工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移民的就业市场不利于女性,移民更有可能从同性别的移民中受益更多,为自身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或联系。根据Zhang的研究,女性移民自身成为农村其他女性重要就业信息的来源。天津的大多数女性劳动移民就是从亲戚和与之拥有共同出生地的人们那里获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6] [P1220]}

(四) 工资收入偏低

从职业分布上看,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在经济结构上、就业结构上处于劣势,她们通常就业于收入较低的职业。工资收入不仅远远低于男性劳动力移民,而且还远低于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其低廉的回报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性的劳动力再生产,仅仅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迁移是一种投资行为,是对人力资本的积极选择。然而在父权制界定男女关系的社会里,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使男子具有更多的特权,重男轻女的文化限制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与程度,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女性劳动力,她们接受的教育普遍偏低,导致她们不太可能担任领导和管理职务,与男性劳动力相比,她们从迁移中获取的收益偏低。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女性从劳动移民投资中获得的收益与回报要少于男性。Hare的研究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中的工资大大低于男性同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巨大。市场经济转型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从国有企业到私有企业,性别工资差距越来越大。Maurer-Fazio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私营企业中工资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6] [P1251]}农业部对安徽和四川农民工的一次调查发现,女性打工者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打工者的55.3%。^[7]

另外,市场经济转型实际上削弱了制度方面对于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支持程度。^[6]越来越多由市场力量引导的、以节约成本和赚取利润为目的的诸多企业不愿意雇用女性劳动者,因为他们认为女性的生理原因和生育责任导致了生产的低效率,使得女性获得城镇就业受到特别的限制。Woon研究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雇主非常青睐男性移民,而非女性移民。女性劳动者是被迫“挤”到某些劳动力领域中的,如前文提到的城市中的服务部门,或者那些脏、累且城市人不屑于干的工作,这些都导致女性移民较低的收入与回报。^[6]

三、婚姻

说到农村女性,婚姻移民肯定是一种重要形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女人的幸福与快乐取决于她的婚姻与家庭,这一观念在当今中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中国随夫居的传统要求已婚妇女要同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因此当其配偶迁移时,女人通常要跟随她们的男人同行,起到支持后者职业、生活与发展的作用。因此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婚姻与迁移之间存在单向关系,迁移是对婚姻的简单线性反应。在该过程中,女性移民是被动的,只是为了与配偶团聚,是作为婚姻的依附者、副产品和结果而出现的。

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联合体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是导致迁移发生的主要拉力因素。在市场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与人口流动性增强,女性不仅仅是作为婚姻的副产品和结果而出现,而是极大地体现出迁移的能动性,即拉力的因素。这种能动性是女性对于户籍制度等结构性限制因素作用的一种反应,是利用自己的资源以达到克服制约因素的目的,实现社会地位和物质的流动。农村男子可以通过参军、接受教育或成为干部而提高他们的社会与经济流动性,而大多数农村女性由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而缺少向上流动的制度化保障,无法摆脱贫困境地,因此她们或许只能以婚姻作为补偿她们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途径。

在她们看来,婚姻不只是简单的生活事件与经历,而是作为其有限的社会与经济流动性的替代品,从而可以改变其弱势地位。因此在婚姻市场中,她们不再被动,而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婚姻作为获得理想迁入地户口的一种手段,进而有机会获得迁入地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从而实现社会和经济流动。可以这样认为,婚姻对于特别是缺乏其他手段以实现流动性的农村女性来说是实现流动性的一种“现实”的方式。在这样一场社会巨变的转型年代,农村贫困女性时刻准备离开自己的村庄,不仅是寻找工作机会,同时也是为了寻找爱情和幸福婚姻。

婚姻作为改变农村女性命运的一种经济策略,使得女性向距离其家乡千里之外的沿海富裕发达省份迈进,很多研究数据都证明这一点。婚姻移民是12个省中女性向外迁移的最主要原因。在西南部,云南省女性向外婚姻移民占全部移民的72.7%,贵州、四川、广西的比例也较高,分别是71.2%、48.6%和42.0%。虽然这四省的婚姻移民数量各不相同,但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占

据跨省女性婚姻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50.5%)。东部是婚姻向内迁移的主要区域。向内婚姻迁移占全部向内迁移的比例如下,河北省是63.0%,江苏是54.5%,福建是50.6%,浙江是47.2%,从全国范围看,这些省份拥有比例较高的女性婚姻移入移民。不难看出,这些省份大多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具体可见图1。^{[8] (P227~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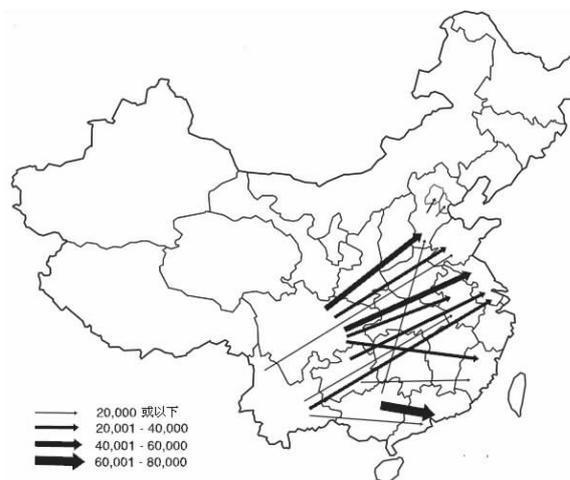


图1 女性跨省婚姻迁移(1985-1990)

四、时限

农村女性进行移民在时限上还存在短暂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资本主义劳动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女性劳动移民的暂时性与临时性。劳动用工经常受到广泛认可的年龄与生产力之间相关性的驱动。大多流水线上的女工都是年轻且单身,年龄大的或已婚的女性是没有优势的。年龄对于是否外出工作是个很重要的解释变量。Tam的研究表明,深圳电子厂在女工到了一定年龄如20岁之后就不再与她们签订工作续约,因为在管理者看来,许多工人的视力弱化就不再适合某些精细的工作。总之,年轻女性要比年长女性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强调年纪和外貌的诸如餐馆和旅店服务行业中。有学者对江苏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表明,20~29岁的外出打工者占到全部女性的45.38%,比30~39岁的多出近10个百分点,女性年龄每增加一岁,迁移机会就要降低1.07个百分点。^[9] 在各类招工和招聘广告中对年龄的需求几乎总是很明显的。

同时,对于相当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来说,当其面临结婚生子时,结婚往往意味着个人发展的中断,因此要求她们在继续工作与结婚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选择结婚,那么则有可能标志

着城市工作的终结,城市工作只代表她们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尽管有外嫁迁入地的主观意愿,但由于农村女性缺少城市居住权,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不能实现的。对于不少女性来说,她们在城市选择婚姻的机会相当少,只能将其婚姻限制在农村地区,因此大多数农村女性到了结婚年龄就会回归到老家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Du 的研究表明,四川和安徽两省男性移民中未婚比例分别为 43.7% 和 48.8%; 而该两省中女性移民中未婚比例分别为 68.3% 和 62.5%。^{[10] (Pg7-100)} 数字表明,女性已婚移民的数量要远远低于男性。总之,对于女性移民来说,婚姻意味着一种剥夺,意味着城市工作的终止,从而剥夺其通过城市工作获得的经济流动性。

另一方面,城市和沿海省份附近的小城镇里的很多人暂时离开农村是为了到附近乡镇企业工作,这样可以继续保留农业户口。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解决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种手段而存在。农村女性在农闲时到城市里打工,在农业季节高峰期返乡参与农村劳动,像候鸟一样不断地来回于城乡之间。这样尽管其丈夫的劳动力有时可能并未体现在农村,但是女性通过和农田不定期的结合而获得对土地使用和权力的合法化。

结 语

在现代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在社会转型的当今中国,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数量庞大、结构复杂且不断扩张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移民群体为了追寻希望与理想而奔走在跨省迁移圆梦的旅途上,她们的流动越来越频繁,劳动力市场的跨区域化与人力资源的流动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可以预见,这一移民潮在不远的将来还将继续奔涌不息。农村女性劳动力作为一个特殊的

迁移群体,她们迁移的行为、特征、过程与男性劳动力存在着差异。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巨变对于个人、家庭、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势必对女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一群体,对于城镇化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C. Cindy Fan. Rural - Urban Migration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ransitional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27 March 2003.
- [2] 侯慧丽. 市场转型时期农村迁移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 [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5 (1).
- [3] Pun Ngai. Becoming Dag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China [J]. *The China Journal*, No. 42 (Jul. ,1999).
- [4] Kanaiaupuni, S. M. Reframing the Migration Questions: An Analysis of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Mexico [J]. *Social Forces*, 2000 (4).
- [5] Hagan, J. M. Social Networks, Gender, and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Resource and Constraint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8 (63).
- [6] Canfei He and Patricia Gober. Gendering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7, No. 4.
- [7] Fan, Cindy C. "Out to the City and Back to the Village" In *On the Move. Women and Rural - to - 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Arianne Gaetano and Tamara Jacka, pp177 - 20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8] C. Cindy Fan and Youqin Huang. Waves of Rural Brides: 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8: 2.
- [9] 苏群,刘华. 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 [J]. *农村经济问题* 2003 (4).
- [10] Du, Ying.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of Its Features and the Macro Context, in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ed. by Loraine A. West and Yaohui Zhao,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Analysis of Rural Female Labor Migrants in Time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LI Yan-chun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 Harbin , 150001 , Heilongjiang , China)

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labor i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for men and wome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rural female labor migrants and interprets the gender dimension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geographic discrimination, high occupational concentration, low rate of return in income, temporality and transitivity are evident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when rural female labor migrants to the cities.

Key words: market transformation; rural women; immigrants;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左安嵩)